

## 黄远生与《时报》

王 红军

**摘要：**《时报》是清末创办于上海的一家报刊，民国成立后，黄远生曾担任该报驻京通信员，现今有关黄远生和《时报》的论述，多依据林志钧编辑的《远生遗著》，对散见于当时报刊上黄远生的材料，未很好利用。本文即以这些原始材料为基础，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李盛铎档案中黄、李二人的来往信札以及其他材料，着重考察黄远生和《时报》发生关联的具体问题，诸如他受聘时该报的立场，《时报》聘请他担任驻京通信员的意图和他接受聘请的原因、在该报发表的通信及其反响，以及后来他为什么离开《时报》等。对这些细节问题进行探讨，不但有助于弄清黄远生和该报的具体关联，也有助于理解当时报业和报人的生态环境，助于我们理解民国报刊史。

**关键词：**黄远生；《时报》；驻京通信员

《时报》是清末创办于上海的一家报刊，在民国成立以后，黄远生接受该报聘任，担任其驻京通信员<sup>1</sup>，撰写了很多受人欢迎的通信。直至今日，这些通信对于民国史研究仍很有参考价值。然而，细阅有关黄远生和《时报》的论述，有两个方面值得检讨：一是这些论述没有很好利用散见于当时报刊上的材料，二是对于黄远生和《时报》之间的关联着墨不多。<sup>2</sup>黄远生担任《时报》

---

<sup>1</sup> 从历史角度来讲，“访员”出现的时间较早，而“通信员”、“特派员”、“记者”出现稍后。以新闻学专业角度言之，这些术语是有区别的，象征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不同的。就黄远生来说，除其投稿外，担任《时报》驻京通信员期间，其报道署名非止一种，有“北京第一特派员远生”、“本馆政界特派员远生”、“本馆政界特派员”、“本馆驻京记者远生”、“本馆驻京特派员远生”、“本馆驻京通信员远生”、“本馆驻京政界特派员远生”、“本馆特派员远生”、“本报驻京记者远生”、“驻京记者远生”、“远生”等数种之多。今为行文方便，除引文外，皆以“通信员”名之。

<sup>2</sup> 黄远生遇刺不久，杜亚泉就著有《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》一文，即因黄远生《新旧思想之冲突》而引起。“五四”前后林志钧的《〈黄远生遗著〉序》、罗家伦的《近代中国文学的变迁》以及胡适的《最近五十年来之文学》等都奉黄远生为“新文艺”先驱，对此，后来的研究并无异议。研究者对黄远生在新闻通信领域的贡献非常关注，其政治倾向、政党理论也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，这方面的论述很多，使用的材料和论述大同小异，恕不一一列举。英语世界值得关注的是 Joan Judge 的《印刷与政治——〈时报〉与清末文化变革》一书，其核心概念是“中间地带”，它借助“公共空间”概念的启示，以《时报》为切入点，阐述清末中国社会存在的“公共空间”，分析作为“中间地带”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和民众之

通信员究竟始于何时？该报为什么聘请他担任驻京通信员，他接受该报聘请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？在《时报》上发表了哪些文章，引起了怎样的反响？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了《时报》？这些问题，也很值得探讨。

### 一、《时报》的创办

经历了庚子年的震荡之后，在“回銮”后逐渐变得浓厚起来的“新政”空气中，<sup>3</sup>“保皇派”和“革命派”之间展开了论战<sup>4</sup>，到1904年初，这种论战变得更加激烈。冯自由说：“甲辰年，康有为命徐勤发刊《商报》于香港，大倡保皇复满主义。《中国报》乃向之痛下攻击，康徒气为之慑。”<sup>5</sup>蛰居海外、被时人目为“保皇派”的康梁，决定在上海创办一份报刊，以“扩张党势于内地”。<sup>6</sup>这份报刊，就是后来的《时报》。

《时报》的创刊，梁启超曾参与了秘密筹划。1904年3月，梁启超赴香港参加保皇大会，4月初由香港潜抵上海，与狄楚青、<sup>7</sup>罗孝高筹划开办《时报》，至该月中旬才离沪返回日本。<sup>8</sup>据参与此次筹划的罗孝高回忆：“甲辰春，任公自澳洲返，至沪时尚在名捕中，未便露头角，乃改名姓，匿居虹口日本旅馆‘虎之家’三楼上。时罗孝高、狄楚青方奉南海先生命在上海筹办《时报》馆，任公实亦暗中主持，乃日夕集商，其命名曰《时报》及发刊词与体例，皆任公所撰定。旋即赴东。”<sup>9</sup>经过一番筹备之后，1904年6月12日，《时报》正式发刊。为防清政府的干扰，乃悬以日商招牌，以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任名义发行人，实际由狄楚青掌社务，罗孝高任主笔。<sup>10</sup>

---

间的互动以及互相“塑造”的关系。这种分析方法，国内也有人附和。参见 Joan Judge, *Print and Politics,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* (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6) 另外，Timothy B. Weston 论述了章士钊和黄远生对待新文艺的不同态度问题。参见“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e Community, 1913-1917”, Sage Publications, Inc., *Modern China*, Vol. 24, No. 3 (Jul., 1998), pp. 255-284.

<sup>3</sup> 王先谦、朱寿朋撰：《东华续录》光绪160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26-227页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》第26册，桂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460-462页。“新政”上谕虽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（1901年1月29日）发布，但彼时尚无暇顾及。

<sup>4</sup> 冯自由：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（上），上海，中国文化服务社，1946年，第43-45页。

<sup>5</sup> 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（上），第162页。

<sup>6</sup> 丁文江、赵丰田编：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上海，世纪出版集团、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82页。

<sup>7</sup> 狄楚青（狄葆贤）是康有为的弟子，于光绪己亥年（1899）参与创立自立会（原名正气会）。参见唐才质：《自立会庚子革命记》，载杜迈之等辑：《自立会史料集》，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83年，第70-71页。有论者认为，他在躬与庚子年（1900年）自立军一役失败后，即转向言论鼓吹，遂有创办《时报》之举。参见张朋园：《立宪派与辛亥革命》，台北，1969年，第55页。

<sup>8</sup> 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第220页。

<sup>9</sup> 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第221页。

<sup>10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香港，大华出版社，1971年，第318页。

《时报》初创时期的立场，实际上反映了康、梁的政治倾向，这在梁启超拟的《时报》发刊词中有所揭示。<sup>11</sup>可以说，“保皇”是《时报》这一时期的主调。<sup>12</sup>武昌革命发生之初，《时报》曾一度持敌视态度，但形势发展迅速，《时报》不得不调整立场，“走向共和”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黄远生正式加入了《时报》。

## 二、进入《时报》

黄远生是何时进入《时报》的呢？曾任《时报》编辑的包天笑回忆：“记得《时报》最初的通信员是黄远庸（笔名远生），……因为他与《时报》的雷继兴（奋）同学，狄平子与他亦相熟，因此《时报》一创刊，即担任《时报》通信。”<sup>13</sup>揆诸《时报》所载文章，1910年8月28日刊出“代论”《余所希望于直省咨议局联合会者》，署名“思农”投稿，<sup>14</sup>1911年7月7日、16日刊出“社论”《亲贵内阁之研究》，也署名“思农”，<sup>15</sup>这些是《时报》最早刊出的黄远生的文章。<sup>16</sup>此外，1911年9月7日在“滑稽谈”栏目还刊出一篇文章《孔门运动记》，署名“远生”。<sup>17</sup>很明显，这几篇文

<sup>11</sup> 《时报发刊词》，《时报》1904年6月12日。

<sup>12</sup> 据康有为云：“己亥六月十三日，与义士李福基、冯秀石及子俊卿、徐为经、骆月湖、刘康恒等创立保皇会。”参见康有为撰，姜义华等编校：《康有为全集》第12集，北京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99页。己亥六月十三日，即1899年7月20日。1903年荣禄死后，“先君以荣禄死，德宗无恙，前在欧、美、澳、亚、非诸洲各大埠设立之保皇会已风起云涌，国内外民气亦渐次发达，可以徐图立宪矣，乃易保皇会名为宪政会。”参见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108页。此时康有为已持君主立宪思想。梁启超则有所反复。他原追随康的观点，当东京学生风潮发生，因为“满洲鬼良弼，干涉监督，不许送学生学军”时，他一度认为“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，惟今勿言耳。”参见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第208页。因受到其师康有为的严厉批评，加上蒋观云函中所谈吴稚晖事和游美见闻等因素，至1903年8月19日，在他写给蒋观云的信中，已经明确表示“惩新党焚乱之状，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”。参见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第215页。对此次转变，张朋园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是康的经济压力；二是畏惧破坏后建设不易；三是与革命党感情日益恶化；四是政治思想由激进转向温和；五是受黄遵宪影响，转趋保守。见张朋园：《梁启超与清季革命》，台北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69年，第167-175页。

<sup>13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348页。

<sup>14</sup> 思农投稿：《余所希望于直省咨议局联合会者》，《时报》1910年8月28日。

<sup>15</sup> 思农：《亲贵内阁之研究》，《时报》1911年7月7、16日。

<sup>16</sup> 按林志钧编辑的《远生遗著》所收录《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》和《人心之枯窘》两文，原来分别载于《论衡》杂志1913年第1号和第2号，皆署名“思农”。据日人神田正雄《忆黄远庸君》云：“船自横浜解缆时，书来告别，且谓由美国将以‘思农生’之别号寄通信于上海。”据此可推知，“思农”当为黄远生另一笔名。参见思农：《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》，《论衡》第1号，1913年5月29日；思农：《论人心之枯窘》，《论衡》第2号，1913年6月5日；冷观：《纪神田正雄君自美国来书》，《大公报》（天津），1918年1月9日。

<sup>17</sup> 远生：《孔门运动记》，《时报》1911年9月7日。

章均属于投稿性质。从这几篇文章判断，此时黄远生尚未正式担任《时报》通信员。到了1912年5月12日，《时报》在“要闻”栏刊出《大借款波折详记》一文，署名“第一特派员远生”，<sup>18</sup>参照李盛铎在《黄君远庸小传》中所言“壬子以后，部长留君任事，而君绝意进取，谢不往。时燕、沪诸友多以新闻论著相属，君亦专以自任”，<sup>19</sup>他也认为黄远生是从1912年始专事新闻撰述。李是黄的前辈，兼有乡谊，李对黄来说，亦师亦友，知根知底，所言应当比较可靠。据此可以推知，黄远生正式担任《时报》驻京通信员的时间是1912年5月。这时距《时报》创刊，已经7年又11个月了。

不过，包天笑还谈到：“在辛亥革命以前，上海报馆在北京所委托的通信员，有些是秘密的。也有的是政界中人，因为非此不足以得到正确重要消息。《时报》馆曾经有一位通讯员姓钟的（杭州人，还是王文韶的孙婿）。为了洩露秘密消息而被捕，幸有王文韶的老面子，得了轻罪。不过到了革命以后，那些通信员，也就公开了。”<sup>20</sup>包天笑进入《时报》馆，在1906年春夏间，距《时报》创刊约两年，<sup>21</sup>其言恐不为无据。因此，也有可能是在1912年5月之前，《时报》已刊载过黄远生的通信，但没有署名。

《时报》之所以聘请黄远生担任驻京通信员，或许是出于以下考虑。黄远生当时已经是比较有名的新闻撰述家，聘请他担任驻京通信员可以提升《时报》知名度，增加发行量，有利于与其他报刊进行竞争。<sup>22</sup>当时报馆之间的发行竞争非常激烈，对此，包天笑深有体会，他说：“为了各报都有了专电，便成一个竞争的目标。譬如北京政府发生一重要的事，这一家报馆有这样一个专电，而那一家报馆却没有，明天报纸上发表出来，这岂不是使没有这个专电的那一家报馆相形失色了吗？”<sup>23</sup>加上康梁此时已从《时报》抽出资本，不再给《时报》以资金支持。<sup>24</sup>所以，《时报》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，必须扩大发行。而聘请知名的通信员，有利于提升报纸的知名度，扩大报纸销路。

---

<sup>18</sup> 北京第一特派员远生稿：《大借款波折详记》，《时报》1912年5月12日。

<sup>19</sup> 李盛铎：《黄君远庸小传》，《申报》1916年2月20日；《东方杂志》第13卷第5号，1916年5月10日。

<sup>20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347页。

<sup>21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313-317页。

<sup>22</sup> 有研究统计，到1911年7月为止，在上海望平街及其附近集中的报馆已有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时事新报》、《神州日报》、《民立报》、《中外报》、《启民爱国报》等7家。到了1912年3月，以“上海报界俱进会”名义通电南京临时政府总统，声明反对内务部暂定报律的，除《时报》外，还有10家报刊。戈公振统计，1912年初，上海知名报刊有15家。分别参见马光仁：《上海新闻史》，上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385页；《上海报界上孙大总统电》，《申报》1912年3月6日；戈公振：《中国报学史》，北京，三联书店，1955年，第179页。

<sup>23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346页。

<sup>24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413页。

其时，黄远生文名已著。据现有材料而言，他在担任《时报》通信员之前，曾向《申报》、<sup>25</sup>《交通官报》、<sup>26</sup>《法学会杂志》等刊物投稿。<sup>27</sup>1912年3月20日，李燮和在上海创办《东方日报》，<sup>28</sup>还聘请他担任特约通信员。据郑逸梅说：“民国以来，李燮和目睹各种报刊风起云涌，他对此很感兴趣，也想试办一张报纸来过过瘾。后来他果然在上海福州路望平街口，办起《东方日报》……又邀请黄远庸为特约通讯员，兼写社论。该报阵容坚强，内容充实，在当时报坛上可称别树一帜。”<sup>29</sup>梁漱溟于1912年2月开始担任《民国报》记者，70多年后，他回忆说：“此时黄远庸（名为基，字远庸，以笔名远生行世）于新闻事业已卓有成就，作为同行的后辈对他颇为仰慕”。<sup>30</sup>显见，黄远生在当时已有一定名气，并受到同行瞩目。

但《时报》聘请黄远生担任驻京通信员，所看中的不仅是他的知名度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获取政界消息的能力。彼时上海的人们对政治消息之关注，从时人记载中可略窥一二：“望平街为报馆荟萃之地，自武昌失守，革命得势以后，各报每得消息，必择其要者，刊发传单，或书之牌上，悬挂门外，以供留心国事者之快靚，意至善也。自是以后，望平街之道路，自晨至夕，皆为之拥挤不开，攒手万人，皆于报馆伫望消息，……旋又由《中外报》转来道署官电，亦言官兵得胜。为安靖人心计，此种电信无论是否确实，报馆亦例为刊载，而标明为官电，以别于报馆之专电。自官电到后，《中外报》馆，即首先录贴，少顷《时事报》馆，《新闻报》馆，亦据西报译出，黏贴门首，见者皆为不豫。时有热心国事者十数人，急欲觐此中之真相，遂相率往《时事报》馆，询问此电所从来。该馆答云，无线电，众以其言近戏，正色诘之，且请其出示电稿。该馆乃告以由《文汇报》转译，众以译自西电，必须注明，不应标题为专电，反唇讥之，遂起譁噪，门外数百人同声应之，并将该馆所悬之牌打毁，又特往《中外》、《新闻》两报馆，扯毁其粘贴之件。时望平街已聚有千余人，同声鼓噪，响遏行云。嗣由捕房急派捕头，率捕解散，众始渐安”。<sup>31</sup>在这种情况下，要吸引人们购阅报纸，就必须满足人们对政界消息的关注。因此，报馆特别在意所聘通信员能否“挖”到政界消息。

黄远生有过不长、但对从事新闻通信来说至关重要的从政经历。在他留学归国之后，经游学毕业考试，由分发河南的“即用知县”改为“直隶州知州”，留原省候补。<sup>32</sup>但他未赴任，而是进

---

<sup>25</sup> 远生：《余之日俄协约观》，《申报》1910年8月1日；远生：《列国对日政策之一斑》，《申报》1911年7月1日。又见《北京日报》1911年7月7日。

<sup>26</sup> 黄为基：《铁道特别会计论》，《交通官报》第27期，1910年12月16日。

<sup>27</sup> 黄为基：《论宪法上列举主义之非》，《法学会杂志》第1年第4期，1911年9月7日。

<sup>28</sup> 《东方日报》，《申报》1912年3月8、9、10、12、16、18、20日。

<sup>29</sup> 郑逸梅：《李燮和办〈东方日报〉》，《文苑花絮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第234-235页。

<sup>30</sup> 梁漱溟：《怀黄远庸》，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1987年10月6日。

<sup>31</sup> 袁庙庙蛇（张篁溪）辑：《辛亥革命徵信录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辛亥革命》（五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、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04-205页。

<sup>32</sup> 《会奏带领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引见折》（并单），《学部官报》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。转引自北

入邮传部。李盛铎说,“时掌部者为徐尚书世昌、汪侍郎大燮,咸相引重”,<sup>33</sup>派兼图书通译局日文总编辑,充辑译股股长。<sup>34</sup>1911年6月,他参与发起宪友会,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之一。<sup>35</sup>四川保路运动还在进行中,他曾“特往谒东海,痛陈利害”。<sup>36</sup>1912年3月18日,他又与籍忠寅、李榘等发起成立国民协进会。<sup>37</sup>到1912年,民国筹设交通部,对清邮传部裁减,留任者仅45人,黄远生即为其一。他虽然“绝意进取”,但其交往的群体中不乏身居津要之士。<sup>38</sup>他与李盛铎、<sup>39</sup>李国珍、汤漪等是同乡,<sup>40</sup>又中过进士,<sup>41</sup>有留日背景,<sup>42</sup>即使对于日本人,他也不乏朋好。<sup>43</sup>他自己本是很多政治活动和一些政治组织的参与者,加上有了这些关系,不但能够熟知政坛的台前光景,也有条件了解幕后隐秘,能访得重要的甚至是独家消息。

另外,黄远生具有卓越的采访能力,可能也是吸引《时报》的原因。如时人汤尔和之言:“远生之探新闻,几于无孔不入,常人所不能到之地,远生无往弗届。寻常所不能见之人,见亦不得其要领者,远生必有术焉,使之不能拒绝;非啻不拒绝而已,且使之不能敷衍,而又乐与为缘。虽立谈之倾,必得其纲要而去。”<sup>44</sup>这正是时人,尤其是报界求之不得之事。

《时报》的这一考虑,在黄远生后来的采访生涯中得到证实。如他采访孙中山就是如此,他在自己文章中曾有表白:“孙中山于八月二十五到京,记者即思一访问其政见,综合所闻,作为此篇。记者既不欲冒昧而往,乃以同盟会中友人某君介绍,于二十九前往。”<sup>45</sup>访问黎元洪亦是如此,

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: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1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3年,第409-410页。

<sup>33</sup> 李盛铎:《黄君远庸小传》,《申报》1916年2月20日。

<sup>34</sup> 交通、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:《交通史·总务编》第五章“庶政”,1936年,第8页。

<sup>35</sup> 《国民公报》1911年6月3日;《宪友会之发起人》,《帝国日报》1911年6月4日。

<sup>36</sup> 《黄为基致李盛铎》,《李盛铎档案》(未刊)甲62,北京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。

<sup>37</sup> 《国民协进会之主要人物》,《亚细亚日报》1912年3月20日。

<sup>38</sup> 《黄远生故交情重》,《亚细亚日报》(上海)1916年1月6日;《黄君远生灵柩不日回国》,《亚细亚日报》(上海)1916年1月9日。

<sup>39</sup> 李盛铎:《黄君远庸小传》,《申报》1916年2月20日;《九江黄君墓志铭》,《社会科学情报与资料》1986年第6期,第140页。

<sup>40</sup> 王葆真:《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》,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编: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8卷第82辑,北京,文史资料出版社,1982年,第140页。

<sup>41</sup>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光绪朝上谕档》第30册(光绪三十年),桂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6年,第119、108页;《殿试题名全录》,《时报》1904年7月15日;《朝考等第单》,《时报》1904年7月21日;汪庆柏编著:《清朝进士题名录》,北京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336页。

<sup>42</sup> 李盛铎:《黄君远庸小传》,《申报》1916年2月20日;《九江黄君墓志铭》,《社会科学情报与资料》1986年第6期,第140页。

<sup>43</sup> 冷观:《神田正雄君自美国来书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1月9日。

<sup>44</sup> 汤尔和:《〈实际应用新闻学〉序》,收入邵飘萍著:《实际应用新闻学》,上海书店,1989年,第5页。

<sup>45</sup> 远生:《记者眼光中之中山君》,《时报》1912年9月5日。

在《谒黎》一文中，他曾这样说：“今记者既到京，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、中外钦仰之伟人，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，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，偕某某二君约见，黎公快然允许。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，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。”<sup>46</sup>

实际上，在黄远生担任《时报》通信员之前，就曾与《时报》馆编辑雷奋保持着联系。<sup>47</sup>雷奋进入《时报》比黄远生早得多，马荫良说：“《时报》创刊后，因保皇气息极浓，读者寥寥，业务不振，罗季高自动辞职，狄即函请在日的陈、雷来沪协助。陈、雷来沪后，约包朗生（天笑）合作”。<sup>48</sup>辛亥革命前，黄远生和雷奋都加入了国会请愿团，都被举为修改呈稿的专任成员。<sup>49</sup>1911年，两人都列名宪友会发起人，<sup>50</sup>都加入了宪友会，且均为宪友会里的活跃分子。<sup>51</sup>这为两人的接触创造了条件。而黄远生在致李盛铎的函中，不止一次谈起雷奋，他说：“继兴尚不来，宪友本部数米而炊，全人闷损。”又云：“继兴自□□后，佩服我公雅量，五体投地，后生小子若吾党者，终不足有为耳。”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，他致函李盛铎云：“《宪报》已归实进承顶，基尚与委蛇，一为孔方计，一即所以自晦，继或当月底来。”当武昌革命爆发之后，他告诉李盛铎：“继兴在南京为苏代表，议但莅临临时政府事，雪楼之举动促及，杨廷栋（翼之）之参谋最多。尔来尚往复通函。”<sup>52</sup>因此可以得知，在这一时期内，黄远生和雷奋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。据包天

---

<sup>46</sup> 远生：《谒黎》，《申报》1914年1月16日。

<sup>47</sup> 包天笑提到黄远生和雷奋是同学。但据《松江志》载：“雷奋（1871-1919）字继兴（又子勤、继星），清松江府娄县人，家住西门外西渡南小街。诸生，留学日本，研习政法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。归国后，任上海《时报》编辑，主编《本埠新闻》”。参见何惠明、王健民主编，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：《松江志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031页。又章宗祥《任阙斋主人自述》云：“戊戌（1898年），南洋、湖北有派学生至日本留学之举。公学派六人，师范生二人，为雷继兴及余。……八月政变作，当局又迟疑，至冬始成行。”参见章宗祥：《任阙斋主人自述》，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：《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·政治军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6页。《自立会史料集》云：“明年壬寅（1902年），戡君翼翬创办作新社于上海，同时复刊行《大陆报》月刊，主张政治改革，继承《国民报》之绪统，主笔如秦力山外，如杨荫杭、杨廷栋、雷奋诸君，皆为当代日本留学界知名之士，以思想与言论激进著称于世。”参见杜迈之辑：《自立会史料集》，第70页。而马荫良说：“一九〇三年冬，陈偕姊丈雷奋（继兴）潜赴日本留学”。参见马荫良：《陈冷在〈申报〉社》，政协松江县委员会文史组：《松江文史》第7辑，1986年，第33页。故雷奋赴日留学有1898年和1903年两说，如系前说，则1902年雷奋即已回国，而黄远生此时尚在浙江湖州府南浔镇浔溪公学就读，两人不可能是同学。究竟孰是，待考。再者，黄远生留学系在日本中央大学，而雷奋系在日本早稻田大学。

<sup>48</sup> 马荫良：《陈冷在〈申报〉社》，政协松江县委员会文史组：《松江文史》第7辑，第33页。

<sup>49</sup> 《新闻旧闻》，《时报》1910年6月13日。

<sup>50</sup> 《宪友会之发起人》，《帝国日报》1911年6月4日；《宪友会发起人》，《国民公报》1911年6月4日。

<sup>51</sup> 《宪友会开会纪盛》，《时报》1911年6月11日。

<sup>52</sup> 《黄为基致李盛铎》，《李盛铎档案》（未刊）甲62。

笑云，狄楚青与黄远生也相熟。<sup>53</sup>黄远生在辛亥革命前已几次向《时报》投稿。以上可以说为黄远生和《时报》建立合作关系作了铺垫。

黄远生接受《时报》聘任，也有他自己的考虑。辛亥革命前后，他不止一次致函同乡李盛铎，抱怨经济问题。其一函云：“蠢眷新来，终日厌恶，一月以内，必须送之南归，公私经济窘迫，又不能不作乞丐，相奈何！（此层伯须为我设法运动）”。又一函云：“宪友会前途辽远，奈何姪为家事所懊恼，日坐针毡，节后必逐蠢妇南归，以是经济益不支，（晋邀之迟即此亦一因）现两人每见必为抱屈称善，而以俭晦相属，真饱汉不知饿汉饥也。（便中可否为之致一信，言基公私债累甚多，自口不敢出口，求一济急了事，年内能得千金，即短差亦可，以家戚日以债务相逼故也）。”<sup>54</sup>从中不难看出，其家庭经济状况很难说如人意，经济困难，甚至为家戚所逼，其窘可知。但他又“绝意仕进”，<sup>55</sup>则生计势必成为问题。

庆幸的是，包天笑记下了《时报》给黄远生开出的月薪。他说自己受聘到《时报》馆当编辑时，月薪不过八十元；其同乡孙东吴比自己早两年到《申报》馆当编辑，每月只有二十八元；<sup>56</sup>当时《时报》馆另一“挑大梁”的编辑陈景韩，月薪也仅一百五十元。<sup>57</sup>但“黄远庸在《时报》写通信，不过月酬二百元，已经算是最高了，其它报馆不肯出此（如当时《申报》的总主笔张蕴和，在外国资本时期，月薪不过四十元）。”<sup>58</sup>相较之下，《时报》馆给黄远生的“待遇”实在不算菲薄。持这种看法的不止包天笑一人，姚公鹤也说：“而薪资之钜者尤以驻京特别访员为最，按月支給有在一二百元以外者，按件支給有每通信十元以外者。近年来黄远庸实此中翘楚。盖通信体例及访员资格经黄之提倡者为不少也。”<sup>59</sup>因此，较高的月薪想必是黄远生接受《时报》聘任的主要原因。而且，此时《时报》在政治态度上持共和立场，与黄远生的政治理想并不违背。

1912年4月，临时政府北迁，《时报》要获得北京政界的消息，聘请驻京通信员成为当务之急。恰值此时，《东方日报》停刊，<sup>60</sup>黄远生与其特约通信员的关系自然结束，这对于《时报》来说正是一个机会。

### 三、《时报》发言

事后证明，《时报》馆的选择没有错，而且黄远生的创作才华也因加入《时报》馆而受到激发，

<sup>53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348页。

<sup>54</sup> 《黄为基致李盛铎》，《李盛铎档案》（未刊）甲62。黄远生夫人名余长贞。

<sup>55</sup> 李盛铎：《九江黄君墓志铭》，《社会科学情报与资料》1986年第6期，第140页。

<sup>56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317页。

<sup>57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414页。

<sup>58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349页。

<sup>59</sup> 姚公鹤：《上海报纸小史》，《小说月报》第8卷第2号，1917年2月25日；姚公鹤著，吴德铎标点：《上海闲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37页。

<sup>60</sup> 郑逸梅：《李燮和办〈东方日报〉》，《文苑花絮》，第235页。

自 1912 年 5 月 12 日他以“北京第一特派员”名义在《时报》发表第一篇新闻通信《大借款波折详记》始，至 1913 年 10 月 19 日《时报》刊出其最后一篇通信《喜日日记》(其二)为止，在 1 年零 5 个多月的时间里，黄远生在《时报》上共发表了约 130 余篇文章，<sup>61</sup>就其内容而言，几乎涉及民国初期民众瞩目的所有重大问题，对诸如宋教仁被刺、唐绍仪内阁和熊希龄内阁倒台、日本对华“二十一条”、唐绍仪逃跑等事件都进行了及时、深入的报道，涉及袁世凯、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、章太炎、蔡元培、黎元洪、唐绍仪、赵秉钧、熊希龄、段祺瑞、陆徵祥、梁士诒、沈佩贞等人物。这里，恕不一一列举，具体篇目可参见拙作《〈远生遗著〉补遗》。大体上讲，关系财经与借款的文章有《大借款波折详记》、<sup>62</sup>《大借款里面之秘密》、<sup>63</sup>《借款之大波折》等 20 余篇，<sup>64</sup>关系内政的有《政界内形记》、<sup>65</sup>《北京黄花岗纪念会》、<sup>66</sup>《地方官制之概略》等 90 余篇，<sup>67</sup>关系外交的有《外蒙独立以前之秘密文件发见》、<sup>68</sup>《蒙古人奇怪之告示》、<sup>69</sup>《内外之形势》等 10 余篇。<sup>70</sup>那么，时人如何看待这些通信，社会反响如何呢？

戈公振在 1913 年调入《时报》馆，他说：“黄初为北京《亚细亚报》撰文，兼为上海《东方日报》通信，《东方日报》停刊，乃为《时报》通信；后又为《申报》通信，其理解力及文字之组织力，实有过人之处。尝谓‘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，叙述一事，贵能恰如其分，调查研究，须有种种素养’；盖报界之奇才也。”<sup>71</sup>包天笑评价黄远生所著《沈佩贞与〈亚东新闻〉之大冲突》说：“读吾友远生所记沈佩贞事，活画一革命伟人，女界豪傑之沈女士，如生龙活虎，跳跃纸上。吾国金帷绣帐之中，沉郁无生气也久矣，难得有女士豪爽之风，一洗庸脂俗粉之习，幸而远生耳。若我者为此女傑之谈锋所噤，早已訥訥不能展一词矣。”<sup>72</sup>后来他又说：“自然那几位特约通信员，都是有政治知识而文笔优富的人，方可以胜任愉快。记得《时报》最初的通信员是黄远庸（笔名远生）”，“这班北京特约通信员，都在报上标明‘北京特约通信记者某某’，虽不是天天要写通信，但一星期至少要有两篇通信。这种有系统的、文艺性的，观察时局，评论人物，用一种轻松而幽默的笔调写出的通信，颇为读者所欢迎。大约每篇总要有两三千字，过短觉得不足以过瘾，过长

<sup>61</sup> 此处按照连载文章合并后计。

<sup>62</sup> 北京第一特派员远生稿：《大借款波折详记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5 月 12 日。

<sup>63</sup> 本馆政界特派员：《大借款里面之秘密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5 月 18 日。

<sup>64</sup> 本馆政界特派员远生：《借款之大波折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5 月 29 日。

<sup>65</sup> 北京第一特派员远生：《政界内形记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5 月 13 日。

<sup>66</sup> 本馆政界特派员远生：《北京黄花岗纪念会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5 月 22 日。

<sup>67</sup> 本馆政界特派员远生：《地方官制之概略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5 月 23 日。

<sup>68</sup> 本馆驻京记者远生：《外蒙独立以前之秘密文件发见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7 月 9 日。

<sup>69</sup> 远生：《蒙古人奇怪之告示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8 月 3 日。

<sup>70</sup> 本馆驻京记者远生：《内外之形势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8 月 20 日。

<sup>71</sup> 戈公振：《中国报学史》，第 183-184 页。

<sup>72</sup> 笑：《吾国之女傑》，《时报》1912 年 12 月 20 日。

则又觉得冗长无味，甚而至于画蛇添足。我们收到了每篇北京通信之后，都排列在专电后，各种新闻前。除非看出它有笔误或有所忌讳外，未敢轻改一字。凡属高才，都不喜人家擅改他的文字。我每见许多编者，恒喜乱改他人文章，自诩博雅，其实识力不足，反致点金成铁，更为作者所不悦，所以因此为戒呢。”<sup>73</sup>“那时黄远生还没有脱离《时报》，他的北京通信稿，是游夏不能赞一词的，读了一遍，看他没有什么笔误，便即发下排字房了。”<sup>74</sup>他还对《时报》所聘的几个驻京通信员进行了比较，认为：“飘萍太忙，发专电是专长；彬彬得不到重要消息，文章多肉而少骨；都不及黄远庸”。<sup>75</sup>他也指出，《时报》通信是黄远生和《时报》共同开创的。他说：“黄远庸最初在《时报》写特约通信，可谓名重一时”，“北京特约通信，系《时报》与黄远庸创始的。这时的《时报》的特约通信，已成空隙了，虽有几位维护《时报》的朋友，偶尔通信，有所报告，那只是客串性质而已。……以文笔而言，飘萍何能及远庸，远庸是个名进士，自八股以至策论，现在又受了新文学的影响，所谓‘腹有诗书气自华’”。<sup>76</sup>可以看出，与戈公振相比，他对黄远生通信的赞赏有过而无不及。

不过，这都属于《时报》“自己人”的评价。被黄远生誉为“报界之大总统”的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也曾给予《时报》通信以高度赞誉，他说：“吾所以不能脱卸党务之故，《时报》通信所记最得其真相，今剪寄。两处当皆有《时报》，或不留心阅，故再剪寄。”<sup>77</sup>还有一位署名“土方”的读者说：“本报外埠通信中，我最爱读京师新闻，而京师新闻中，我尤爱读远生君之笔墨。盖同一事实，一经远生君之笔墨描写而渲染之，便觉天趣盎然，使人对之津津有味。质之阅报诸君，其以我为知言否？”<sup>78</sup>这两者都是以读者的立场发表看法，其赞美之意，不谋而合。<sup>79</sup>

还有别的读者也有类似体会。邹韬奋在其回忆中说：“在那个时候，我对于《时报》上的远生的‘北京通讯’着了迷。每次到阅报室里去看报，先要注意《时报》上有没有登着远生的特约通

---

<sup>73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 348 页。

<sup>74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 415 页。

<sup>75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 348 页。但马荫良、储玉坤不这么看，认为“邵氏的采访才干和写作能力，在当时都是第一流，与黄远庸比，有过之无不及。”参见马荫良、储玉坤：《史量才接办〈申报〉初期史料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编辑室编：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第 5 辑，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0 年，第 158 页。

<sup>76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续编》，香港，大华出版社，1973 年，第 67 页。

<sup>77</sup> 梁启超：《致梁思顺（1913 年 5 月 2 日）》，张品兴编：《梁启超家书》，北京，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146 页。

<sup>78</sup> 土方：《时事谈屑》，《时报》1913 年 10 月 19 日。

<sup>79</sup> 后来的新闻史著述中也延续了类似的评价，如《中国新闻史》云：“譬如《申》、《新》、《时》三报在北京都有特派员，他们的学识才能，远胜于一般访员，是报界中第一流人才，如《申报》的北京特派员前为邵飘萍，后为陈倦鹤，《新闻报》为张一苇（即张季鸾），《时报》为黄远生，其探访能力及写作，确是不同凡响。”参见朱宗良：《民国初年之上海报业》，《报学》第 1 卷第 9 期，1956 年 6 月。转引自李瞻主编：《中国新闻史》6，台北，台湾学生书局，1979 年，第 360 页。

讯。我特别喜欢看他的通讯，有两个理由：第一是他的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，他每遇一件要事，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，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，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情形；第二是他写的实在好！所以好，因为流利、畅达、爽快、诚恳、幽默。他所写的内容和所用的技术，都使当时的我佩服得很，常常羡慕他，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。想诸君也许还记得，远生就是名记者黄远庸先生的笔名。我当时对于他的为人怎样，完全不知道，但是在文字上认识了他，好像他就是我的一个极好的朋友。后来他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冒险南下，我已在中学里，对于他的安危，简直时刻担心着，甚至有好几夜为着这件事睡不着。他离开上海赴美国，途中还写了好几篇短小精悍、充满着朝气的通讯登在《申报》上，是我生平最倾倒的佳作。我正切盼着他能继续写下去，不料他到旧金山的时候竟被暗杀，真使我郁郁不欢，好像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。”<sup>80</sup>这里显示出，邹韬奋由阅读黄远生的通信而产生的强烈共鸣，成了影响其职业选择的因素。<sup>81</sup>

---

<sup>80</sup> 邹韬奋：《经历》，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99年，第17-18页。学生时代的胡适也曾经迷恋过《时报》，甚至在他到美国留学时，还在阅读《时报》。后来他总结《时报》让少年人爱恋的两大原因：“第一，《时报》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，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，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，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。”“第二，《时报》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。”在他眼里，《时报》俨然成了引领潮流的旗帜。他没有提到黄远生的通信，当黄远生开始成为《时报》的通信员时，他己身在美国康南尔大学（Cornell）近两年了。参见胡适著：《胡适留学日记》（上），合肥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4、63、102页；耿云志：《胡适年谱》，香港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，1986年，第19、20、23、24页。大约与胡适同时的另一位读者在日记中记下了对《时报》的另一种感受，参见何荫枬：《钜月馆日记（稿本）》，《清代日记汇抄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360页。

<sup>81</sup> 另外，黄远生的通信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时人对待报业人员的观念，姚公鹤、雷瑨都曾谈及当时报人待遇和生活之低劣，包天笑和戈公振也有类似记载和体会。但是，黄远生的境遇似乎要好得多。据梁漱溟回忆，当他因请教法律问题见到黄远生时，发现黄“作为名律师、名记者居处考究”。黄远生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准，可能是从事律师活动而获得收入，也有可能是为《时报》通信而获得报酬。但《时报》给他200元月薪不单是因为他有进士和留学生头衔，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他通信员职业身份的肯定。宋云彬说：“黄远生偏以新闻记者的资格，今天见大总统，明天访国务卿，使得那些大人先生们不敢轻视记者。”参见姚公鹤：《上海报纸小史》，《小说月报》第8卷第1、2号，1917年1月25日、2月25日；《东方杂志》第14卷第6、7号，1917年6月15日、7月15日，另见姚公鹤著，吴德铎标点：《上海闲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28、131页；雷瑨：《〈申报〉馆之过去状况》，《申报》馆编辑：《最近之五十年》，上海，《申报》馆，1923年，第453、454页；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322页；戈公振著：《中国报学史》，第101-102页；据梁漱溟《致黄席群函》云：“大约在1914年，我由陕西回京，因西安某寺一法律问题而自愿代为之请教者，其时我一青年学生耳。”梁漱溟赴西安在1913年阴历正月初五，约三个月后又返回北京，则他见到黄远生应是在该年下半年至1914年初之间。1913年1月，农林总长陈振先控《亚细亚日报》揭载狎妓一案，黄远生曾出庭为《亚细亚日报》辩护。该年11月，黄远生已列名北京律师公会。参见梁漱溟著，梁培宽编：《梁漱溟书信集》，北京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77-178页；梁漱溟：《怀黄远庸》，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1987年10月6日；

然而，或许真应了那句“物极必反”的古训，这些通信也引起了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在黄远生结束《时报》通信员事务之际，《亚细亚日报》曾刊出他的“不党之言”：“鄙人言论为活，无党最佳，往日有党如无，此后更不须有党。自今以往，请宣告与所隶之党脱离，并誓言终吾之身，吾之名字永远与‘党’之一字断绝连贯的关系，同人中多有误会者，故特声明。”<sup>82</sup>他自认为对各种政治势力“不偏不倚”，但他的直言无忌早已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，<sup>83</sup>一如李盛铎所言：“而论人不免有臧否，论治不能无从违，名盛忌随，危机斯伏。”<sup>84</sup>其命运已播下隐忧。

在 1912 年的政治舞台，有三大政治力量并存，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群体、以张謇等为代表的东南立宪群体和以孙中山、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群体。<sup>85</sup>这几种力量都想把政治影响推及于全国，但都未脱浓厚的地方特色；既相互角逐，又不时做出妥协；既存在着留恋皇权的势力，也有要求民主共和的力量；中央殊党政令难以推行，地方又感到中央干预过重；部分汉人欲扫荡满人而廓清之；部分满人还想“拿”回失去的江山；“新人物”想在新国谋一席之地，“旧人物”却不甘心拱手让贤；外部力量常显示与我友好之面孔，也不错过顺手牵羊的机会。《时报》和黄远生就生存于这样的环境中，双方都感到有话要说，《时报》给了黄远生一个展示自身才华的“公告板”，黄远生向《时报》亮出了一枝生花笔，两者在现实的种种刺激下，共同向大众提供了扣人心弦的文字，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，为民国初期进行的多方面探索提供了发人深思、促人警醒的声音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，是《时报》成就了黄远生，黄远生也成就了《时报》，两者共同开创了

---

梁漱溟：《忆 1913 年往西安事》，《梁漱溟全集》第 7 卷，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93 年，第 524 页；梁漱溟：《这个世界会好吗》，上海，东方出版中心，2006 年，第 36-37 页；《专电》，《申报》1913 年 1 月 9 日；《律师公会为送会内律师清单致检察厅函》，北京市档案馆编：《北京档案史料：1999》，北京，新华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32 页；宋云彬：《民初记者黄远生》，《宋云彬杂文集》，北京，三联书店，1985 年，第 458 页。

<sup>82</sup> 《黄远生之无党主义》，《亚细亚日报》1913 年 10 月 20 日。

<sup>83</sup> 至 1931 年，黄远生著作中的部分文章仍被国民党政府内务部认为“触忤时讳”。黄席群说：“1931 年商务计划再版，申请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审定，当局认为其中《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》和《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》（其一至其四）等五篇，触忤时讳，应予删削，故一直拖延未能重印。”参见黄席群：《追忆先父黄远生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编辑部编辑：《新闻研究资料》总第 28 辑，1984 年，第 98 页；黄席群：《写在〈远生遗著〉新版问世之际》，《读书》1984 年第 9 期，第 113 页。

<sup>84</sup> 李盛铎：《九江黄君墓志铭》，《社会科学情报与资料》1986 年第 6 期，第 140 页。

<sup>85</sup> 另外，梁启超群体也颇有声望，但与其说此群体是一种政治力量，不如说他是一种舆论力量，甚至是引领舆论趋向的力量，其成员虽也有经济政治利害上的，但更多的是基于理念上的，因而其联系是松散的，一如其政治立场和态度，是漂移的。这一群体可以和国内其他力量暂时合作，又会瞬息分离。它经常借助其他力量行动，也常被其他力量所利用。徐君勉曾慨叹：“吾党之弊，全在理想太多，实事全无，不免有文人习气，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？”又云：“同志望吾党在内地进行眼将穿矣，而始终无一实事，令弟子何以措词，筹款则函电交驰，而坐以待毙，宜乎外人之目为马扁矣，可痛。”愤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参见徐君勉：《致南海夫子书》（1912 年 4 月 12 日），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第 407 页。

民国初年《时报》历史上的“远生通信”时代。

也许正因如此，当江苏的元老们决定要重点办好《申报》的时候，就不但从《时报》“挖”走了其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陈景韩，也拉走了众人瞩目的前台明星黄远生。

#### 四、离开《时报》

1912年9月23日，史量才与席裕福订约收购《申报》，并于10月20日正式接办。<sup>86</sup>为了顺应“言论报纸”向“新闻报纸”转变的趋势，《申报》开始筹建遍布全国各地的新闻网，而“北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，政治新闻的来源地，各报都把北京作为重点，驻在北京的特派员都是国内闻名的第一流的记者。”<sup>87</sup>《申报》馆开始到处“挖”人，这一举措，直接影响了黄远生和《时报》的合作关系。

如前所述，早在辛亥革命之前，黄远生和《申报》之间就有了联系，不过严格说来，只是偶尔的投稿。1912年11月，《申报》曾经刊登他的一篇通信，署名是“北京通信员思农”，<sup>88</sup>而最迟到1913年8月，他已成为《时报》和《申报》两家报纸的驻京经理人。<sup>89</sup>但这时，他显然还不是《申报》的正式的通信员，因为在刊登过那篇通信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，《申报》上没有刊登他的通信。包天笑说：“后来史量才接办《申报》馆，便把黄远庸拉去了，但仍为《时报》偶尔通信。”<sup>90</sup>实际上史量才正式接办《申报》时，黄远生为《时报》撰写通信的势头正盛。只是到1913年10月19日，黄远生的《喜日日记》才在《时报》刊登完毕，<sup>91</sup>此时距史量才接办《申报》，已经整整一年。而且，自此以后直至黄远生遇刺，无论他与《时报》馆人员还保持着怎样的来往，《时报》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通信。他的《时报》通信员生涯就此打住。

可能此时的国内局势让他感到极度抑郁和绝望，因为就在他那篇名为《喜日日记》的通信在

---

<sup>86</sup> 关于史量才接办《申报》的日期，普遍的说法是史量才与席子佩签约是在1912年9月23日，正式接办是在10月20日，马荫良、储玉坤、徐铸成亦持此说。但1915年9月3-4日，《申报》曾刊登过一则启事，说：“按本馆同人，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，以至今日，所有股东，除营业盈余外，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等，除薪水外，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。……《申报》馆经理房、主笔房同启。”据此判断，接办时间应在1913年。两说孰是，待考，本文暂从前说。参见马荫良、储玉坤：《史量才接办〈申报〉初期史料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编辑室编：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第5辑，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54页；徐铸成著：《报海旧闻》，北京，三联书店，2010年，第16页；《本馆启事》，《申报》1915年9月3-4日。另外，有关此次产权变更的议论很多，非关本文主旨，此处不赘述。

<sup>87</sup> 马荫良、储玉坤：《史量才接办〈申报〉初期史料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编辑室编辑：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第5辑，第157页。

<sup>88</sup> 北京通信员思农：《工商部之政策》，《申报》1912年11月12-13日。

<sup>89</sup> 《上海〈时报〉经理人致电政司函》，《亚细亚日报》1913年8月4日。

<sup>90</sup> 包天笑：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第348页。

<sup>91</sup> 远生：《喜日日记》，《时报》1913年10月17、19日。

《时报》刊登完毕的同时，他宣布了自己的“不党之言”。这时，他颇有意于出洋游历。当时北京的报纸报道说：“北京新闻界著名记者黄远生近忽中止通信之业务，拟作日本之游。记者顷叩以意向之所在，据称迩来对于时事多所激励，因之脑病日增，故思暂赴扶桑，稍资休息，且便中于彼邦文艺、新闻等事有所调查，约三月内外可以回京云。”<sup>92</sup>为此，他做了认真准备，有报道说：“北京报界巨子黄远庸氏，现因与政党断绝关系，洒然无累，拟赴日本考究政治、文学，闻不久即离京东渡，因之特请驻京日本新闻记者本日在其侨居饕饮，以资接洽云。”<sup>93</sup>然而，他刚到上海，就有人怀疑他出洋怀有政治目的，据《黄远生之东游再志》云：“黄远生养病东游，已志前报，兹悉远生此次往日，因资斧无出，有受财政部委托调查彼邦簿计之事，此等事在外邦，亦所常见，乃外间遂谓熊总长将俟黄君东游归，与以财政次长位置云云，某报亦竟据以登载，实为误会。盖远生若要做官，原不必有出洋考察之名而后可也。”<sup>94</sup>或许就是受人误会的缘故，最终他出洋游历的设想没能实现。报云：“上海《申报》驻京记者黄远生君，前拟赴日考察新闻事业，兼受财政当局之委托，调查彼邦官厅簿记。黄君旋至上海，未赴日本即行回京。闻其原由，因黄君抵沪，南方人士不知底蕴，妄加揣测，谓黄君此行于政治上有何关系，黄君恐滋误会，遂中止东游。”<sup>95</sup>

虽然赴日远游未能实现，但1913年12月他的上海之行，可能“顺便”完成了另一项使命，那就是和《申报》达成合作协议，正式成为《申报》驻京通信员。他自己曾说，“余此次以事来游上海，旅居兼旬”。<sup>96</sup>究竟是什么事，在他的著述中没有说明，或即前文所说东游之事，但也不排除与《时报》和《申报》两馆接洽业务之事。因为当他打消出洋游历计划时，就有报道说他“返京以后，专从事《申报》通信事务，其所领财政部之公费，日内即将全数交还该部云。”<sup>97</sup>在一年以后发表的《新年闲话》一文中，他自己也说：“余之始从事于本报也，在民国二年十一月三十一日，其第一通信为《岁暮余闻》，其时盖国会业已解散，熊内阁渐将不稳，而财政渐取包办政策之时也。”<sup>98</sup>《岁暮余闻》实作于1913年12月31日，发表于1914年1月5日，其所称11月31日或为12月31日之误。他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，声明：“悠久卓越、即在中国报界中颇古之《申报》，今由鄙人担任北京通信及经理事宜，倘荷订阅，请直寄函示前门外东南园经理处，当即专足派送。一个月份一元，三个月份两元八角，报资先惠。”<sup>99</sup>再者，从1914年1月起，《申报》开

<sup>92</sup> 《黄远生之东游》，《亚细亚日报》1913年11月10日。

<sup>93</sup> 清：《黄远庸君游东消息》，《顺天时报》1913年11月14日。

<sup>94</sup> 《黄远生之东游再志》，《亚细亚日报》1913年11月12日。

<sup>95</sup> 《黄远生东游作罢之真因》，《亚细亚日报》1914年1月21日。

<sup>96</sup> 远生：《上海之新艺术》，《申报》1913年12月30日；远生：《岁暮余闻》，《申报》1914年1月5日；远生：《东游鸿爪》，《亚细亚日报》1913年12月22-25、27-30日。26日报纸缺。

<sup>97</sup> 《黄远生远游作罢之真因》，《亚细亚日报》1914年1月21日。

<sup>98</sup> 远生：《新年闲话》，《申报》1915年1月10日。

<sup>99</sup> 《黄远生启事》，《亚细亚日报》1914年1月21-24日、2月1-6、9、10、12、14-26日。

始比较密集地刊登他的通信。由此推知，从这时起，他方正式为《申报》通信。<sup>100</sup>此前，张謇曾以陈景韩打麻将为由，不赞成其担任《申报》主笔。那么，他对聘请黄远生担任《申报》驻京通信员有什么看法，是不是也有过反对意见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<sup>101</sup>

黄远生曾有过从政的机会，<sup>102</sup>但他选择了从事新闻著述作为其主要的职业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以突出的采访和写作能力为《时报》撰写了很多受人欢迎的通信，成就了《时报》的一段辉煌；《时报》也回报以相对优厚的待遇，解决了他生活的后顾之忧，也使得他文名满天下、举足轻重，书写了清末民初报刊史上的一个传奇，对后世的媒体从业者影响深远，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地位也十分突出，至今犹让人感慨和缅怀！

---

<sup>100</sup> 马荫良、储玉坤说：“北京是当时我国的政治中心，政治新闻的来源地，各报都把北京作为重点，驻在北京的特派员都是国内闻名的第一流的记者，《申报》为与各报竞争而加强地位，于一九一四年聘名记者黄远庸（远生）为驻北京特派员，在《申报》发表北京通信，深受读者欢迎，公认他为‘报界之奇才’”。参见《申报》编写组马荫良、储玉坤：《史量才接办〈申报〉初期史料》，第157-158页。

<sup>101</sup> 辛亥革命前，黄远生颇不嫌于张謇，在他致李盛铎的函中可见一斑。1912年5月，黄远生参与发起的国民协进会和张謇所属的统一党与民社、民国公会、国民共进会、国民党合并为共和党。9月，黄远生在共和党为张謇举行的欢迎会上致欢迎词，对其赞誉有加。虽然公开的言论和私下的交流不可同日而语，但经历了辛亥革命，黄远生深感政治和社会改造不易，对张謇的“恶感”或已有所减轻。参见：《黄为基致李盛铎》，《李盛铎档案》（未刊）甲62；《张季直抵京》，《时报》1912年9月15日；《共和党欢迎张季直纪略》，《时报》1912年9月18日。高拜石在《黄远生域外惊魂》一文中，以颇具艺术性的笔调描绘黄远生写作、娱乐两不误的情景：“他的旧学新知，都有很好的成就，描写既深刻，文笔又泼辣，心敏手捷，数千言顷刻立就，不论在戏园里观剧，或是在妓院里打麻将，侍者传来电话：‘报馆等稿拼版’，他随便拿起笔来就戏单或叫条的局票上，疾风扫落叶般带草连真一气写下，他的书法，无人比其劣，也无人比其快，一纸继一纸，随写随付给车夫，持交报馆。梁任公常和他在一起，见他那样，连称‘了不得’”。参见高拜石：《黄远生域外惊魂》，《新编古春风楼琐记》第1集，北京，作家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17页。梁启超确曾打牌，且牌技尚佳，其家书中有关打牌记载颇多。1912年11月25日，1913年3月3日、4月16日以及8月5日致梁思顺信札中就屡屡提及。参见张品兴编：《梁启超家书》，北京，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2、100、134、154页。黄远生在《忏悔录》中颇忏悔自己“过恶丛集”、“理不胜欲，故以堕落；欲又不能胜理，故以苦痛”等等，但遍观黄远生的著述，未见其有打牌的记载。实情如何，待考。

<sup>102</sup> 1904年中进士后以“即用知县”被吏部掣签分发河南；1912年临时政府北迁后组建交通部，清邮传部600余名人员中，黄远生为45名被留用者之一。

